

第一章 曙光依稀

——清末教育世纪之交的嬗变

封建儒家科举教育曾是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的有力支柱，孕育了封建社会空前而持久的繁荣，但在超稳定的自我循环圈中，走到了尽头，日趋衰败，在遭遇强敌入侵，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多次惨败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无可奈何花落去。自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潭以来，清王朝摇摇欲坠，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发展经济和革新政治，模仿欧美和日本进行教育改革，诞生了新教育的萌芽，培养了首批新式人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于封建社会“士”阶层的新一代文化教育科技知识分子，从思想、制度和方法上孕育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基础，从而揭开了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序幕。期间，新旧教育思潮交错，相互砥砺，教育改革风雷激荡，进一步打破了旧教育秩序的沉寂，迫使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旧教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没有挽歌的葬礼中逐渐死亡，教育界空前活跃，新教育观念日益流行，新教育制度逐渐生根成长，中国教育新世纪近现代化的曙光依稀可见。

一、始设同文馆，培养涉外人才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清王朝不得不放弃“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洋

人打起交道。两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国耻民辱，促使国人反省，有志之士逐渐认识到，原因就在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技不如人”，但在其他方面仍具有优越性。一批稍有远见、试图挽救败局的封建官僚群体掀起了探求“过渡之道”、追求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央以王亲贵族奕?、文祥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大批汉族封疆大吏为代表，以及依附他们的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容闳、王韬、郑观应等一大批先进文人。前者主要是领导具体改革，后者侧重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支持。其中，张之洞对新教育贡献巨大，王韬、郑观应的思想已经成为维新时期改良教育的先导。他们秉承魏源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强调所谓的“变器不变道”，学习西方的“技艺”，兼顾学习“西政”。总结洋务运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讲制造也，则必曰精算学；言交涉也，则必曰通语言；办教案也，则必曰谙外交；言通商也，则必曰通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概之以一名词，曰洋务。洋务派在当时“敝絮塞漏船，腐木支大厦”的时代条件下，认识到若欲改变中国积弱累贫的现状，兴办“西学”，提倡“新教育”，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且是“目前当务之急”。洋务教育，不仅创办了新式学校，而且改革了教育内容，等于在腐朽沉闷已久的封建教育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开展洋务活动，首先急需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因此于1862年在京师设立同文馆，由俄罗斯馆改为英文馆。此后，各省陆续效仿建立类似的外语学习机构。这项举措奠定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交流的基础，也奠定了新教育产生的基础。

1862年，恭亲王奕?上奏朝廷，得到批准。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同文馆开始时先设立英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入学。总理衙门从八旗陆续送京学生中先挑选13—14岁以下的10人试行教习。后经英国使馆威妥玛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

尔腾(John.S.Burdon)为英文教习,又聘请徐澍琳为汉文教习,设置提调,满汉各一人。8月制定了《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六条》,是为我国近代学校的先声。1863年4月23日,京师同文馆添设法文馆、俄文馆,聘请法国人司默林(A.F.Smorrenberg)、俄国人柏林(A.Popoff)为师,张旭升、杨亦铭分别为两馆汉文教习,每馆招收学生10人,仍限制于旗人。1872年,增加了德文馆班;1896年,又增加了日文学馆,并将俄文馆并入,共习英、法、德、俄和日五国语言文字。

1866年,同文馆内增设算术馆,练习天文算术,以为制造轮船机器的准备,逐渐超越了外语学校的定位,成为兼习科学技术的综合性学校。此后,又设立了观象台、格致馆,具备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教学,标志着中国新式学校出现科技教育的萌芽。生员资格提升,招生资格为举人、贡生,或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年龄要求30岁以下。学习期限为8年,学习外文、汉文、史地、代数、几何、三角、微分、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富国策等,分学年分科选择学习,外文为共同必修课程,自始至终都要学习,最后四年,注重翻译著作。

1866年3月23日,总税务司赫德告假回国,建议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同赴西方游历。前知县斌春与同文馆学生风仪、德明、彦慧等3人,随赫德离开上海,先后至法国、英国、瑞士、俄罗斯、普鲁士等国考察,是为同文馆学生游历外国之始。学生在学习外语之外,还学习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以及生理、解剖等课程,学制8年。修完全部课程,举行结业考试,平时也有各种大小考试,成绩纪录在案,优者奖励,劣者降级。高年级学生在学习日常课程之外,还要翻译所学语种的书籍,经过教师修改审定,一旦达到印行标准,立即印行,由此翻译了不少万国公法、自然哲学、世界史纲、政治经

济学等著作，为了解西方和世界，向国人打开了一扇窗口。

1863 年 3 月 11 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专门招收 14 岁以下天资聪明的汉人子弟，主修课程为外文，副修课程为经史小学等。1864 年 6 月 23 日，广州将军瑞麟在广东成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称为广州同文馆，专招八旗子弟。1887 年，新疆巡抚刘襄勤设立了新疆俄文馆，台湾巡抚刘铭传设立了台湾西学堂，吉林将军长顺设立了鄂春俄文书院。1893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湖北自强学堂，设置方言、算学、格致、商务等学科……

为统一各地教学，总理衙门特规定考试规则，每三年大考一次，成绩优异者予以褒奖，或派部学习，或分发各省，或调用驻外使馆参赞、翻译，或派往国外学习。1888 年，戊子乡试，总理衙门将各省之监生及同文馆学生 32 人同考，考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一名。这是我国第一次实行中学与西学同考，等于抬高了西学的地位。

通观京师同文馆及地方方言馆的设立，与历史上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是一所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为“洋务外交”而开办的学堂，是一所以外国人为主要学科学习的学堂。特别是 1866 年底开始的延续半年之久的一场关于是否应当扩展办学的大辩论，改变了京师同文馆的语言学堂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开创性地位。尽管阻力重重，但天文算学馆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增设了，数学、化学、物理、万国公法、生理、医学等西方近代文化课程也逐步陆续开设，数十名热心教育、学有专长的外国学者先后受聘到馆任教，几百名年轻学子进入馆内学习西学，正途出身的科甲人员不但可以“拜异类为师”，而且学习西学同样可以博取功名。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和办法首先在馆内试行，为其他学校所仿效。换言之，一场大辩论使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成为传播西学、

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基地。其意义在于：第一，它表明传统教育的变革再也不能局限在对旧制度、旧体系进行修修补补的范围之内，必须另辟蹊径。其次，所谓新学校，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是教育内容的更新，宣告四书五经垄断学校教育内容的局面必须打破，更富有生命力的西学知识应当进入学校领域，这是传统教育更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再次，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开始淡化，“重道轻艺”、“贵义贱利”、轻视科学、鄙薄技术等陈规陋习受到极大的冲击，培养官宦人才不再是学校教育的惟一培养目标，而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事实上成为此后各类新式学堂创办的基本动因和办学宗旨。最后，“严夷夏之大防”的旧观念最先在教育领域开始动摇，“奉夷人为师”成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必然捷径。

总之，京师同文馆自创设到并入京师大学堂历时 40 多年，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应当肯定，它在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严密僵化链条上率先打开了一个缺口，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标志着中国新学制的开端。它培养了一批外交、科技方面的人才，采纳了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教学内容，翻译了一批科技类实用著作，在实践上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冲击，为后继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开办军事与实业学堂，培养实用专业技术人才

“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富国强兵，尽快扭转军事和经济的落后局面，这是中国发展新教育的主要动力，而开办军事学堂和与之相关的实业学堂无疑是新教育的主力军。因此，在开办同文馆之后，接着有洋务派陆续创办的上海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学堂及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军事实业学校。

曾国藩、李鸿章于 1866 年设立上海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其组织为提调 1 人，口述 2 人，笔述 3 人，校对书画 4 人，翻译格致、化学、制造类著作，前后翻译出版达 178 种。

同年，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学堂（初为马尾船政局求是堂艺局），由沈葆楨主事。学堂附属于船政局，被认为是船政的根本所在。这是最早专门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人才的学校。次年 1 月 6 日开学，分为前后学堂，两校教育体制按照英国、法国海军学校成规。前堂学习法文，学习造船术；后堂学习英文，练习驾船术。经书课程为必修课。后又增设驾驶学堂、管轮学堂等。学生达到 300 多人。与京师同文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培养轮船制造、设计、运输等方面的科技人才，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根本。其次，始终采取外语训练和专业学习同时并进的方针，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均远远超过京师同文馆。第三，生源一开始就没有严格的界限，打破了京师同文馆只招八旗子弟和满族官员的规定，显示出平民化色彩；而且聘请的外国师资也比京师同文馆多，不仅有外籍学科专家，还有外籍工匠师傅。第四，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学校管理和教学方法，严格考核，严格淘汰，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并重，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学堂兴办以来，业绩突出，成为我国近代培养科技人才的主要摇篮，代表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如果说京师同文馆是“西语”教育思潮的产物，福建船政学堂则是当之无愧的“西艺”教育思潮的产物。从“西语”到“西艺”，反映了国人心目中西学内涵的扩大、价值的提高。把西语引入学堂是为了“不受外人欺蒙”，学习西艺则是为了“西法可衍于中国”，后者更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语言学堂和技艺学堂数量之比由 60 年代的 3:2 下降为 90 年代的 4:17，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

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军事技术学校蓬勃发展：1874 年成

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军事工程学校。1876年由丁日昌奏请成立了福州电气学堂。1880年8月19日，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次年落成，分为驾驶及管轮二科，用英文教授，此外学习操法、经史和国文等，是为最早的海军专科学校。9月16日，李鸿章又奏请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11月6日成立。1882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1885年，李鸿章又奏请设立天津武备学堂，是为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学员选自军中和文员，一方面学习西洋行军方法，另一方面在军中实习，学习期限为一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埔水鱼雷局内附设鱼雷学堂，1906年并入1887年成立的广东水师学堂。1888年，醇亲王奕譞创立北京昆明水师学堂，专门培养八旗海军人才。1890年曾国荃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1894年12月8日，李鸿章在天津总医院附设西医学堂，培养军医人才。1895年2月2日，张之洞在南京创设江南陆军学堂。1896年3月1日，张之洞奏请在湖北武昌设立湖北武备学堂……1901年9月11日，清政府命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军校大兴，成为当时教育发展的一大景观。

纯粹的实业学堂，要算1896年张之洞在江西省高安县设立的蚕桑学堂；1898年，他又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延请美国教授2人为师，在湖北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杭州等地纷纷仿效。1902年12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筹办的农林学堂开学，此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农林学校。1904年10月，农工商部奏准筹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1912年后改为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同年，上海史家修创设女子蚕桑学堂，为女子专科职业教育之始。

三、改革普通学堂，培养新式人才

我国的新教育是在外力影响下而产生的，无论是翻译类学校

还是军事、实业学校，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特殊需要而设立的专科教育。而新式普通教育却开端于外国教会组织在华设立的教会学校。

1845 年，美国圣公会首先设学校于上海，命名为约翰书院；1871 年，又在武昌设立文华书院；到光绪末年，两学校均改为大学。1864 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设立文会馆；1866 年，英国浸礼会在青州设立广德书院，两学校后来合并为广文学堂，1917 年，与济南医学院合并为齐鲁大学。1888 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与公理会 1893 年在通县设立的潞河书院合并为燕京大学。1881 年，美国督理公会在上海设立中西书院，1894 年又在苏州设立中西书院，后来二者合并为东吴大学。1885 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澳门等地设立学校，后来合并为岭南大学。1906 年，英国伦敦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后美国介入，此为第一个英美教会在中国举办的医学校。1907 年 5 月 20 日，德国人宝隆设同济医院于上海，此为同济大学前身。1908 年美国南北浸礼会在上海杨浦区创办浸会大学，此为沪江大学前身。1909 年 12 月，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文华大学，1924 年与其他大学合并为华中大学。1910 年，美国教会设立南京汇文书院、宏育书院，后合并为金陵大学……这些学校虽然是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课程中注重外语及科学，完全不同于旧式学校，可算是新式学校中最早的一类发源。

而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学堂是中西学合璧的书院和普通学堂，如 1869 年兴建的湖北经心书院、1873 年兴建的陕西味经书院、1874 年兴建的上海格致书院、1888 年创建的广州广雅书院、1897 年创建的浙江求是书院。真正意义上的新学堂当以盛宣怀 1895 年在天津开设的中西学堂为最早，分头等和二等两个等级。前者相当于专门学校，四年毕业，课程分为普通、专门两种，普通课程有汉文，第一年教授几何、三角、格物、绘图、史鉴、英

文，第二年学习驾驶、测量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化学、绘图、英文，第三年学习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绘图、英文，第四年学习金石学、地学、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英文；专门课程分为五门，即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律例学。二等学堂相当于中学，招收 13—15 岁的儿童，学制为四年，以中英文为主要课程。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1897 年 4 月 8 日开学，考试选拔首批学生 40 人，内设立师范学院、上院、中院、下院四部，初步具有学制的意义，比中西学堂更进一步。同年 10 月，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长沙举办了湖南时务学堂等，熊希龄主办，梁启超主讲，学校存续时间虽短，但培养出蔡锷、范源廉等高材生。1898 年，御史张承缙奏请在五城设立小学堂、中学堂，由孙家鼐办理，是为京师创办小学的开始，也是全国最早设立的公办小学。还有湖南湘乡举人创设的东山精舍，华亭、钟天纬在上海开办的三等学堂。1901 年 9 月 14 日，清政府下发兴学诏，谓：“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1 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准创办的山东大学堂开学。同月，浙江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此为浙江大学前身。1902 年河南巡抚奏设河南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设山西大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设贵州大学堂，江西巡抚奏请改豫章书院为江西大学堂，陕西巡抚与藩司创办关中大学堂，为西北大学前身。1903 年，袁世凯在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的基础上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堂开学，陕甘总督委派知府杨增新为提调，在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后改名为甘肃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学堂同时创办……

私立中学最早的，有 1901 年熊元锷等在江西南昌创办的心远中学；1903 年胡元淡等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明德中学，该校次

年设立高小甲乙两班；1904 年张伯苓等在天津创办的南开中学。最早的幼稚园是在 1903 年成立的武昌幼稚园，聘请了三名日本保姆为师资，仿照日本幼儿园模式。

这种自下而上建立的新式学校由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逐步取代面向科举的旧式私塾学校，迎来了新教育的曙光。

四、开辟留学教育，流通社会风气

中国向来是文化教育发达的国家，在“顺差”的情形下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对外交往则大多数是输出文化教育，亦有极少数为学习佛教和天主教教义的留学生。自天朝大国衰落之后，在“逆差”的情况下不得不屈尊降贵，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向以往的“夷狄之国”学习。这既是中国教育走出封闭、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逐渐被突破和变革、中国教育开始西化并融入世界教育潮流的重要表现，更是实现教育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从历史的角度看，留学生在中国新旧教育制度转变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义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言：“现代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是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或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①

留学教育作为实现教育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虽然比新式学堂的出现晚了 10 年，而且时断时续、几起几落，但封闭的国门一旦打开，终难再行封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再也无法遏止。回顾上半个世纪的历史，这一期间留学教育出现过三次高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8 年，第 1 页。

潮。

（一）初出国门，留学美欧（1872-1895）

军事技术层次较量的失利，使国人看到“国势衰败在于人才匮乏，人才匮乏在于教育不振”。第一批留学生以幼童留学美国和福建船政学堂留学欧洲为中心，他们走出国门，是突破封建传统观念束缚的结果，与以往留学教育不同的是，这次留学是带着复兴中华的目的而走出国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旧观念的自然消失，相反，在留学教育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夷夏之辨”、“道器之辨”的激烈争论，影响着留学教育的方向、内容和形式。

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始于 1872 年，由于同文馆办学成绩并不理想，培养人才供不应求，因此曾国藩应容闳之建议，开始筹划选学生赴美国留学。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美国是第一个与中国签定互派留学生条约的国家，1868 年 7 月 28 日，《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第 7 条有互派留学生的明文规定；其次，有留美归来号称“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容闳从中作伐促进。因此促成了 1871 年 8 月 18 日，曾国藩、李鸿章奏陈选派幼童赴美学校，拟就了著名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还拟定《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12 条。规定选送幼童赴美每年 30 名，4 两共计 120 人，学习期限 15 年，学生年龄以 12-14 岁为标准，目的在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兼学经史。同年，容宏在上海设立留美学生预备学堂。1872 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率詹天佑等 30 人作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学习，年龄最大的 16 岁，最小的 10 岁，尤以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人数最多，占总数的 94.2%，其中开放的广东人就占到总数的 70%。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大规模留学

欧美日诸强的序幕。

对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留学盛举，几个当事人评价极高。留学教育的倡导者、组织者、被后人尊称为“近代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回忆说：“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 1854 年予毕业之时，以至 1872 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① 留学教育的最大支持者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仰亦古来未有之事。”^②

1874 年，清政府命容闳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建造中国留美事务所，扩大留美事务。因保守派学督吴子登的阻挠和国内封建守旧势力的干扰，及美国本土出现的排华逆流，1881 年 9 月 6 日，100 多名留美学生全部撤返回国，留学事业被迫中途搁浅。

在派遣留美学生的同时，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沈葆楨所奏派。他按照福建船政学堂章程，于 1875 年，派遣刘步蟾等几名船政学堂学生，随法国人日意格赴法学习。1877 年，他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合奏《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正式拟订章程，共派遣四届生员赴法学习军事，学生中有后来著名的严复、萨镇冰等人才。

从整体上看，以福建船政局为主派遣的留欧学生成效优于早期的留美幼童，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学生均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至少受过 5 年以上的专业 and 外语训练；有一定的中国文化功底，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无需再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3 页。

② 转引自田正平著：《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7 页。

学习经书和国家律例。其次，留学目标明确，采取的是定向教育，费时少而收效大。第三，要求严格，管理得当。第四，留学国比较广泛，英国和法国，得以相互比较，学习其长。第五，汲取了留美幼童的教训，留学生生活待遇、学习条件和社会环境均有明显好转。归国后，除在造船和海军系统发挥重大作用外，在沿海省份及对外交涉中也都崭露头角，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此主体之外，到海外留学还有两条途径，一是教会资助，如近代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妹（1864—1934）在宁波长老会牧师资助下于 1881 年赴美攻读医学。二是自费出国，如伍廷芳（1842—1922）于 1874 年赴英国攻读法律等。

这一时期留学生派遣总的特点是人数少、规模小、时断时续，处在起步阶段。但其开社会风气之先的作用不容低估，它主要不是表现在西学课程的引进、教育内容的嬗变、新师资的配备等具体而微观的变革方面，而是具有宏观性特点，其积极意义在于，它通过解决国内某些领域急需人才的现实，冲击和改变了当时社会的旧观念和旧风尚，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扫除了心理障碍，从而加速了封建教育的解体，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二）留学日本（1895—1908 年）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再次丢尽了天朝大国的脸面，而且带来了亡国亡种的空前灾难，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促使向西方学习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师夷之长技不再是学习几种技术，而是老师向昔日的学生学习取经，探讨“治国之本”、“富强之源”，掀开了留学教育的新篇章。

1896 年，日本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带领学生唐宝锷等 13 人赴日学习，是为我国学生留学日本的开

始。1897 年初，京师同文馆增设日文馆，招收学生 12 名。1898 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实施，留学日本逐渐成为社会热点。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请中国扩大派遣留学生赴日，总理衙门复函同意。1901 年 9 月 16 日，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1902 年 2 月 1 日，清政府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这样以来，留日学生规模逐渐扩大，仅官费、自费留学生一项，就由 1899 年的 200 名左右，达到 1903 年的 1300 多人，1906 年再次达到 8000 人上下，超出同一时期派赴各国留学人员的总和。还有大批官员不绝如缕于东渡取经考察途中。

之所以出现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其一是因为清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提倡和鼓励，留日学生经过考核后给予科举出身；其二是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其三是民族危机感的强烈激荡；其四是因为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文字相近，容易通晓，并有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可借鉴。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新局面，表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第一，留学生来源广泛，不再限于沿海省份，边远和内陆省份也有，而且年龄跨度大，官员绅士比例增多，自费生比例急速扩大，女性比例增长，并被纳入正规渠道，教会资助比例极小。其次，研习科目多样，不再限于数理化或军事技术，而扩大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学教育、学师范、学法务、学政治、学军事成为热点，而且以接受普通教育和速成教育者占绝大多数。第三，爱国热情高涨，民族自强意识强烈，日本成为酝酿革命的基地，从中涌现出黄兴、邹容、秋瑾、宋教仁、廖仲恺等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留日学生虽然总量上仍然保持首位，但热潮在 1907 年之后逐渐消退，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留学生派遣政策发生转变，转而采取严格限制政策，既有提高质量、节约经费和国内学堂逐渐增多的原因，更有惧怕革命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留学生政策的影响，1905 年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开

始整顿国内泛滥的语言培训学校，严格留学生资格。第三个原因是国内普通学堂有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学补习教育的需要。

这一时期留学教育是以留日为中心的留学教育全面发展的时期。就留学欧美的情况看，第一，自费生比例显著升高；其次，留学国别广泛，选习科目注重实业，修业年限增长；第三，学风“刻苦沉实”，质量高于留日生。

总之，这一时期留学生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既表现在宏观方面，也体现在微观领域，既在参与现实的、改革传统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为中国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理论上、队伍上的积蓄和准备，积极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投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产生了近代第一批教育家群体。

由上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后，留学生走出国门，是国人历经耻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巨大冲击，所作出的重大理性选择，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产物，是封建传统教育实现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同样，留学生作为近代中国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一个先进群体，他们对西学东渐，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庚子赔款”留学美欧热（1908年以后）

随着留学日本热潮的消退，中国近代教育因美国带头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吸引留学生而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留学美欧再度兴旺，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虽然美国有其主观利益考

虑，认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但客观上助长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1906 年 3 月 6 日，美国公理会牧师 A.H.Smith 觐见总统罗斯福，请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此款或息金作为岁派中国学生就学美国之经费。1907 年 12 月 3 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要求授权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用于资助中国留美学生。1908 年 5 月 25 日，得到国会批准，规定自 1909 年起至 1940 年，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 10785296.12 美元。同年外务部、学部《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开始以庚子赔款名义选派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在最初的 4 年内，每年派遣 100 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 5 年起，每年至少派遣 50 人，直到用完为止。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肄业馆一所，即为后来的清华学堂（学校），清华大学之前身，规定十分之八学习农、工、商、矿等科，其余学习法政、理财、师范专业。1909 年 10 月，第一批庚款生梅贻琦等 47 人赴美学习，以后趋于正常。这是继 1872 年首批幼童赴美之后，又一次有计划、较大规模的留美学生派遣。它标志着留学欧美高潮的再度兴起，拉开了第三次留学高潮的序幕。

庚子赔款兴学受到了清政府的欢迎，这样既能缓解留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急需专业和高深人才的需求，也博得了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好感，美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似乎更具有诱惑力。同时，欧美各国教会组织在中国创办的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也是促使留学生潮流逆转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留学生归国后的从业情况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与留日学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不同，留美学生学历较高，多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 and 重要岗位任职。

综观这一时期留学生教育的特点是：第一，全方位派遣，博采各国之长，改变了大起大落、过分集中于某一国家的畸形发展

状态，遍布近 20 个国家。第二，留学美国仍然是一大热点，从 1909 年到 1929 年间，仅由庚款派遣或享受庚款津贴的各类留美学生达 1800 余人，从世界范围看，在各国留美学生中占据前列。第三，留学生的考选、派遣日趋严格化、制度化，一般是由教育部把名额分配给各省，由各省经过第一次考试，通过者再经教育部第二次考试确定。第四，公费、自费同时并举，鼓励自费留学，在政策上降低留学资格，不以地域分布为界限，如果选择国家急需专业或学业成绩优异，可以转为公费生，归国后待遇与公费生相同。这是适合国情培养人才的明智做法。第五，留学生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在知名大学学习和获得学位的人数明显增加。

但清末民初以来留学政策的偏颇和留学生在国内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批评与政府的反思，认为留学教育只可以当药吃，不能当饭吃；留学生与其多而滥，不如少而精；留学教育必须与国内教育相配合，立足国内是发展教育的根本所在，促使政府着手调整留学政策。

五、设立京师大学堂，孕育新学制

上述设立的各种学堂，都没有一定的章程，随环境的需要及创办人的意愿而设置增减。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对学制的确定意义重大，又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其中维新派功不可没。

维新派猛烈抨击封建科举教育制度，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明确指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智其民也，五者缺一不可。”因此，多次上书皇帝，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广开学校，以养人才”。1895 年，康有为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即请光绪皇帝变科举、兴学堂。1896 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